

易卜生笔下凯蒂琳形象的斯芬克斯因子与伦理选择

李银波

内容摘要：易卜生创作的第一部戏剧《凯蒂琳》讲述了古罗马贵族政治家凯蒂琳的反叛及灶神庙女尼弗瑞亚对他复仇的故事。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为理解这部作品及其主角凯蒂琳的形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剧中凯蒂琳遇到两对矛盾：第一，在事业上做英雄还是做普通人；第二，在爱情上追随妻子阿瑞丽亚还是追随灶神庙女尼弗瑞亚。这两对矛盾实质上就是凯蒂琳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之间的矛盾，矛盾斗争的结果也必然影响他在一系列问题上的伦理选择，包括当情人还是丈夫、当英雄还是普通人、当烈士还是逃兵、当俘虏还是罪人、进天堂还是地狱等。作品中主要存在两条伦理线，一是政治伦理线，二是爱情伦理线，这两条伦理线因弗瑞亚的复仇而交织在一起。

关键词：易卜生；《凯蒂琳》；斯芬克斯因子；伦理选择；伦理线

作者简介：李银波，历史学博士，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西方文化与文学、跨文化传播的教学与研究。

Title: On Catiline's Sphinx Factor and His Ethical Choices: A Study of Ibsen's Play *Catil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bstract: *Catiline* was Henrik Ibsen's first play, which told about an ancient Roman noble politician Catiline (108-62 B.C.) who led a rebellion against the Roman government but was revenged by the nun Fulvia from the Vesta Templ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to this play and Catiline's role. In the play, Catiline is faced with two conflicts: to be a hero or a nobody in his career, and to follow his wife Aurelia or the nun Fulvia. These conflicts actually derive from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his human factor and animal factor, and influenced his ethical choices in a series of matters, such as to be a lover or a husband, to be a hero or a nobody, to be a martyr or a deserter, to be a captive or criminal, to enter the paradise or the hell, etc. There are mainly two ethical lines in this play, the ethical line of politics and of love, which are interwoven due to Fulvia's revenge.

Key words: Henrik Ibsen; *Catiline*; Sphinx factor; ethical choice; ethical line

Author: Li Yinbo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Law,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0, China). His research areas include Western cultures and literatures, and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Email: yinbo0385_cn@sina.com

《凯蒂琳》（*Catiline*, 1849）是挪威著名戏剧家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 1828-1906）创作的第一个剧本，它取材于古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历史。据历史记载，当时罗马共

和国完全丧失过去的民主精神，元老院贵族争权夺利、贪污腐化，少数贵族元老独揽大权，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也尖锐化。时为罗马重要军事统帅的鲁侠斯·S·凯蒂琳（Lucius S. Catilina，英语为 Catiline，108-62 B.C.）因多次竞选执政官失败，于公元前 62 年起兵反叛罗马元老院，结果全军覆没。凯蒂琳被正统史学家描写成“淫棍”、“歹徒”、“坏蛋”、“野心家”（克里斯普斯 1-92, 156-171）。易卜生不同意正统历史学家的观点，想为这位古罗马“叛贼”的悲惨遭遇鸣不平（396），因而创作了这部无韵诗体三幕剧。易卜生后于 1874 年修订了该剧本，但该剧的初版和修订版都不成功，因而被各国学者普遍忽视。该剧中译本于 1986 年才出版，中国读者对该剧也比较陌生，对其评介很少。虽然《凯蒂琳》“是羽毛未丰的戏剧家的第一次试飞”且不成功（克勒曼 36），然而易卜生在该剧中播撒的种子却是不容忽视的，它孕育着易卜生后来戏剧创作的许多特性，因此该剧仍有研究的价值。

凯蒂琳由恶棍变为英雄，其性格具有强烈反差。其性格何以如此复杂多变？其性格与命运及剧情的发展关系如何？这些疑问可通过分析凯蒂琳身上的斯芬克斯因子给予解释。根据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观点，每个人都是一个斯芬克斯因子（Sphinx factors）的存在。斯芬克斯因子由人性因子（human factor）和兽性因子（animal factor）两部分组成，兽性因子即动物的本能，是恶的思想和行为的根源，而人性因子即理性或伦理意识则是善的思想和行为的根源。斯芬克斯因子的不同组合和变化，不仅构成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且还影响人物的伦理选择（ethical choice）并决定人物的命运。斯芬克斯因子能够从生物性和理性两个方面说明人的基本特点，即人无完人（聂珍钊 38-39）。剧中凯蒂琳身上斯芬克斯因子的组合与变化，大致经过了四个阶段。在不同阶段，其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构成不同，因而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影响他做出不同的伦理选择，从而决定他的命运。

幽会时的伦理选择：当情人还是做丈夫？

凯蒂琳在灶神庙与弗瑞亚幽会前，其行为明显受兽性因子主宰，选择当淫棍，纵欲作恶。

在戏剧开头，凯蒂琳在小山丘发表的一段独白，就暴露出其内心的矛盾，而这内心矛盾就是其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之间的冲突。凯蒂琳说：“心灵深处的声音在催促我前进——我决定听从它的召唤。我有勇气，也有足够的力量，去追求远比目前更为高尚百倍的生活——目前，这不过是一串无节制的放荡——！”（13）^①他心灵深处的声音就是为了正义的目标干一番惊天动地、青史留名的英雄伟业，或者说当一个英雄。这是他的人性因子的表现，是他理性的要求。然而，他又说：“我青年时期的梦想全都哪里去了？它们已像盛夏飞驰的云彩一样飘散，除了悔恨、悲愁，什么也没留下”；“只要严酷的现实发出一点声响，它们便立即向心灵幽深处隐藏”（13-14）。这表明凯蒂琳的人性因子处于被兽性因子压制的状态，偶尔浮出水面，但很快又被淹没。他的行为“不过是一串无节制的放荡”，听命于兽性因子。

他刚刚发表了一通自白对自己进行诘责，就不顾亵渎神灵的禁忌，偷偷进入神圣的灶神庙与女尼弗瑞亚（Fulvia）幽会，仅仅是因为“我喜欢换换口味”，仅仅是想尝尝“这禁果——是何滋味”（23）。从他的两个理由看，凯蒂琳是在不断地换口味，“无穷无尽——在情欲中讨生活”（14），到处寻花问柳，毫无顾忌，胆大妄为，无法无天。

可见，凯蒂琳到灶神庙与弗瑞亚幽会前，他的思想和行为基本上被兽性因子控制。由于缺乏理性，也就没有了禁忌和善恶观念，因而他选择当淫棍而不做英雄，选择玩弄侵害

女性而不钟爱妻子,选择通过行贿竞选执政官。即使他身上的人性因子偶尔觉醒,但很快又昏睡过去。正是他在兽性因子支配下纵欲作恶,为他后来失败和毁灭的命运埋下了祸根。

凯蒂琳到灶神庙与弗瑞亚幽会,拉开了剧情冲突的序幕。凯蒂琳万万没有想到,他这次幽会的灶神庙女尼弗瑞亚,竟是他年青时强奸致死的西尔维亚(Silvia)的姐姐。弗瑞亚顶替西尔维亚成为灶神庙女尼,过着地狱般的生活,因此弗瑞亚对凯蒂琳怀有双重的仇恨。弗瑞亚并不认识仇人凯蒂琳,但一直在寻找他以报仇雪恨,没想到他竟找上门来。

凯蒂琳被灶神庙女尼弗瑞亚的美貌吸引,潜入神圣的灶神庙与弗瑞亚幽会,本想和她调情,甚至有可能强奸她。但弗瑞亚对灶神庙生活的抱怨和对罗马黑暗政治的抨击激起了凯蒂琳的强烈共鸣,也激活了他身上的人性因子。因此,他心中的善得以放大,恶得以收缩,对弗瑞亚不仅没有无礼之举,相反却对她充满尊重。这时,凯蒂琳的人性因子激活后做出了一个重要选择,即选择当弗瑞亚的情人,而不是当她的玩弄者或强暴者。

弗瑞亚也被凯蒂琳无法无天的大胆行为所震撼,对他谴责罗马的言辞产生同感,同时被他英俊的外表吸引,因此对凯蒂琳产生了深深的爱慕和信赖。不过,她此时还不知道这位鲁侠斯就是害死她妹妹西尔维亚的凶手凯蒂琳。弗瑞亚先是提出要凯蒂琳带她私奔:“让我们离开这里,逃到遥远的远方去,另寻一个新的、更美好的祖国”(26)。这不仅意味着她要同凯蒂琳一起离开罗马,还意味着她要与凯蒂琳结婚,做他的妻子。然而凯蒂琳已经有一位心爱的妻子,而且他还怀有在罗马成就一番英雄伟业的梦想:“为了从这混乱中拯救罗马的自由,为了使它消失的光彩再一次重现,将决不吝惜,像刻尔夏斯一样,把自己抛进深渊——”(27)。因此凯蒂琳拒绝了她的私奔要求。这一拒绝是他在爱情问题和事业问题上做出的一个重大选择,即选择当弗瑞亚的情人而不做她的丈夫,选择留在罗马战斗当一个英雄,而不是离开罗马当一个普通人。他的选择是在人性因子影响下做出的,是他的理性选择。

然而,在弗瑞亚的美色面前,凯蒂琳的兽性因子仍然处于活跃状态,他的人性因子的力量仍是有限的,理智还不是很清醒。当弗瑞亚因众女尼即将到来而劝他离开时,凯蒂琳恋恋不舍地说:“我走;不过,一会一定还得回来,一种神奇的力量使我离不开你身边”(27-28)。这种神奇的力量实际上就是他身上的兽性因子。弗瑞亚看出凯蒂琳已经迷上她了,既然他不想将她从灶神庙拯救出来并同她结婚,那就利用他来现实自己的愿望。于是她要凯蒂琳发誓替她报仇,“我要你发誓把我的仇敌看作是你自己的不共戴天的仇敌。行吗?我的鲁侠斯?”(28)而凯蒂琳竟然不问清她的仇敌是谁,是什么仇,就发誓要替她报仇,“我发誓:我将像一个魔鬼,直追他到天涯海角!”(28-29)等他发完誓后,才想起问弗瑞亚仇敌是谁,结果发现仇敌就是凯蒂琳自己,因为是他强奸了弗瑞亚的妹妹导致她投河自杀。弗瑞亚发现这个令她心动的男人竟是她寻找多年的仇人,强烈爱情立即化为满腔仇恨。她说:“报复之神显然已听见了我的祷告——现在你已经发誓要对自己报仇!你活该倒霉,凶残的恶人!你活该!”(30)于是,弗瑞亚由一位红颜知己变成一位复仇女神,凯蒂琳成了她不共戴天的仇敌!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久经沙场的名将和情场老手凯蒂琳大为惊恐,他说:“啊,这太可怕了!”(30)他脸色铁青,冲出了灶神庙,不小心扑灭了灶神庙中的圣灯。守护圣灯的弗瑞亚受到牵连,要被活埋处死,更加深了她的仇恨。因此,由于凯蒂琳以前的恶行,他的这次选择以失败而告终:他选择当弗瑞亚的情人,却变成弗瑞亚的敌人。

自凯蒂琳在灶神庙与弗瑞亚幽会起,他开始遇到两对矛盾,面临着两大伦理选择:第一,

在事业上做英雄还是做普通人。第二，在爱情上追随自己的妻子阿瑞丽亚（Aurelia）还是追随灶神庙女尼弗瑞亚。这两对矛盾实质上就是凯蒂琳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之间的矛盾，而矛盾斗争的结果也必然影响他在这两大问题上的伦理选择。灶神庙的幽会对剧情的发展和凯蒂琳的命运都具有重要影响，它不仅使该剧两大矛盾从此交织在一起，而且凯蒂琳在这两对矛盾上做出的每一次伦理选择都影响着他的命运，并决定剧情的发展。

归家后的伦理选择：当英雄还是做普通人？

凯蒂琳在灶神庙中的经历使他异常震惊，回到家后仍然心有余悸。他说：“这也许正是一个预兆，——或一个警告，告诉我现在正等着我的是什么命运。那么说，我现在是已经对我自己发誓了，我将不惜以流血的报复来抵偿我过去的罪行”（33）。可以说，这次幽会使凯蒂琳身上的兽性因子得到约束，人性因子大大强化并终于取得主宰地位。他终于认识到他的恶行最终要遭到报应，因而不能再继续行恶了，尤其不能再贪恋和玩弄女色。此时，凯蒂琳的性格发生了重大转折，善恶意识大大加强，理性意志变成了主要力量。

凯蒂琳开始正视自己的困境和使命，变得理智起来：“更伟大的工作也等着我全力进行。这动荡不安的时代也对我发出了紧急呼吁；对那件事我必须即时进行周密的思考”（33）。他所说的“更伟大的工作”和“那件事”就是他正在密谋的反罗马起义，就是他想成就的英雄伟业。这表明，他的理性已经战胜了原欲，人性因子控制了兽性因子。

凯蒂琳的政治处境糟糕却理想宏伟，他要重振罗马的辉煌决非易事，这意味着流血和战争。他虽然已经在谋划一场战争，但条件和时机都不成熟。是坚守理想还是放弃理想？是做英雄还是做普通人？他陷入了伦理困惑之中。

他的妻子阿瑞丽亚提出了一种选择，要他放弃理想，夫妻一起逃离罗马，隐住乡野过普通人生活。阿瑞丽亚提出这种选择，既然出于对丈夫的爱怜、对丈夫处境的同情和担忧，也出于对丈夫“无节制的放荡”（13）的不满以及对自己幸福的保护。但是，凯蒂琳同样表示拒绝：“你要我抛撇下这片土地——到别处去？你要我放弃我一生最大的梦想？落水的人，虽然被救的希望已渺茫，也仍会不顾一切死死抓住破碎的船板不放”（37）。他不愿放弃理想，要斗争，想做英雄。在妻子对隐居生活做了一番动人的描述后，他有些动心，勉强答应了妻子的请求。但他心里并不甘心放弃自己的梦想，而是希望“哪怕只有一分钟，像一颗流星闪烁一下，发出耀眼的光芒”，希望“通过一件光辉的业绩，我能够使凯蒂琳的名字永垂不朽”（53）。

他的不满罗马现状、企图谋反的贵族朋友兰吐勒斯等也给他提供了一种选择，那就是由凯蒂琳领导他们起兵反叛罗马，推翻政府，建立自己的政权。兰吐勒斯和塞西加斯于当晚来到凯蒂琳的住宅，拜请他出任叛军领袖。这正是凯蒂琳向往的道路，不过，他决不愿与这邦乱国谋私、贪图享乐的酒肉朋友同流合污。他们谋反的动机不纯，他们不是为挽救和重振罗马，而是为了“对个人伟大前途的向往”和“享受一切人间欢乐的地位”（48）。他们起事绝对不会成功，即使成功也不会有好结果，那只会将罗马带入到更加黑暗的悲惨境地。如果他参加他们的行动，那就是选择当乱臣贼子而不是英雄。另外，他还在迟疑和犹豫中，不愿过早暴露自己的意图和行动计划。因此，凯蒂琳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请求，还“伪装”得一本正经地说：“我岂能甘心做国家的叛徒，挑起一场内战——用罗马人的血玷污我的双手？不成！我决不能这样！”（45）他宣称要和妻子当晚永远离开罗马，远走高卢过宁静的农夫生活。

因此做英雄还是做普通人,现在对凯蒂琳来说,就是要留在罗马领导一场军事政变还是与妻子一起逃离罗马,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凯蒂琳在政治上竞选执政官失败并在元老院遭到西塞罗的公开斥责,他虽在密谋推翻罗马政府以实现其政治理想,但条件和时机却不成熟。兰吐勒斯等人请他领导叛乱,但他们叛乱目的与他的政治理想相悖,他已经断然拒绝。他纵然壮志凌云,却走途无路。因此他若留在罗马,除了继续苦苦等待起事时机外,别无他计。凯蒂琳在罗马不仅官场上失意,在情场上也遭受打击:弗瑞亚又反目成仇成为他的复仇女神。因此罗马成了他的失败之地、痛苦之地。但是罗马也是他的希望之地、成功之地,只要他留在罗马,他就还有一丝成功的希望。如果答应妻子离开罗马过隐居生活,他就只能成为一个普通人,做英雄的梦就彻底破灭了。在做英雄还是普通人、成功还是失败、生还是死的人生十字路口,他认为应该想清楚再行动。于是当兰吐勒斯和塞西加斯离开后,凯蒂琳又将妻子打发去休息,然后一个人在月光下思考当晚与妻子逃离罗马去高卢隐居的做法是否值得的问题。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抉择,关系到他一生的梦想与前途。

从凯蒂琳当时的处境看,他这时在家中的所作所想,都显得很理智,善恶观很明确。这时他对妻子温和而尊重,对普通士兵也极为仁慈,相反对那些谋私不轨的朋友的不法图谋却又正辞严地加以拒绝。他认为在去与留的重大问题上必须认真权衡。这些都是较明智而人性的作法,思想和行为体现为善,是人性因子发生作用的结果。

但是,他还未来得及想清楚,他的思维就被弗瑞亚打断,并受到弗瑞亚的操纵和影响。这时从坟墓里逃出来的弗瑞亚来到凯蒂琳家,凯蒂琳十分惊恐,以为是弗瑞亚的鬼魂来复仇。弗瑞亚谎称说:“仇恨到了坟墓里便会消散”。凯蒂琳对她的畏惧和防备之心顿时消除。弗瑞亚还谎称她知道凯蒂琳的命运,并说要永远追随凯蒂琳:“但我却知道你的命运。我是你的影子,——离奇的、神秘的纽带,已把我们捆绑在一起”(55)。不知何去何从而迫切想知道自己命运的凯蒂琳立即被她的话打动,还被她的美色所吸引。他的兽性因子的力量开始增强,人性因子的力量开始减弱,竟没有看出弗瑞亚的复仇意图和阴险计谋。在凯蒂琳的心中,弗瑞亚很快由复仇女神转变为命运女神。

弗瑞亚在打消凯蒂琳的警惕并取得信任后,开始煽动和引诱他去追求心中的理想,实施起义计划,当一名英雄,甚至去夺取皇帝宝座。她对凯蒂琳说:“那你为什么天生具有英雄气概?”“你现在是站在生活的三岔路口:那边,一条无聊的无所作为的路在等着你——那里有一种介于睡眠和死亡之间的半生半死的生活——可是另一个方向你却可以在你的前面,看到一个皇帝的宝座”(57-58)。凯蒂琳很快就被打动了:“啊,你触动了在我心灵最深处颤动着的那根琴弦。你所讲的每一个字都正是日日夜夜我的心灵一直在向我低诉使我难忘的心事”(59)。他热血沸腾,决定不逃离罗马,而是留下来战斗:“我决不走了!你的话重新复活了我幼年时的热情生活、我成年后的成熟的梦想”(60)。在这激动时刻,他脑中突然闪现“复仇女神”的想法,但此时他已经完全被她吸引了,复仇女神似乎又变成他的爱神。他说:“啊,可爱的复仇女神——你是我的影子——我的心灵的真实化身”。于是他与弗瑞亚握手宣誓,保证立即采取反叛罗马的军事行动:“这里是我的手,我向你做出万世不变的保证”。这一握手,使他更加智昏心迷。他说:“啊,你的触摸,像一道火的河流穿遍了我全身的血管!”“我的两眼越来越呆滞”(61)。他身上的兽性因子进一步膨胀,理想被唤醒,但野心也被激活;他的勇气被激发出来,但情欲和权力欲也被激发出来;相反他的理性却几乎被淹没。

凯蒂琳的宣誓是他做出的一个最重大的抉择,即他决定放弃过普通人的隐居生活,选

择做一个惊天动地的英雄，甚至要当罗马皇帝。他决定立即采取军事行动，全力为他的政治理想奋斗，做出一番青史留名的伟业。他说：“我的额头发烫……它宣告我为追求伟大、追求王权、追求永垂不朽的名声而进行的战斗已大获全胜”（62）。凯蒂琳的确头脑发热，理智昏迷，竟然没有意识到自己中了弗瑞亚的圈套，没有认识到是她在实施其复仇计划。

于是凯蒂琳来到反叛者集聚的一家酒馆，宣布自己愿意领导反罗马的军事行动，以重振罗马，以让罗马人民获得“自由和幸福”。但是，叛乱贵族要的却是“权力和财富”，这与凯蒂琳的意图相悖。在这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凯蒂琳的理性还没有迷失，他斥责说：“你们这些下流坯子！你们究竟是不是你们的古代祖先的子孙？”（71）对此兰吐勒斯喊道：“啊，打倒他！”（71）许多人拔出匕首向他冲来，凯蒂琳却从容地拉开自己的上衣敞开胸膛，此举吓退了那些持匕首的人。他于是慷慨陈辞，终于说服众人发誓为“重振古老的罗马”这一伟大目标贡献自己的生命并服从他的领导。凯蒂琳正气凛然、临危不惧、沉着勇敢，其表现的确像一位英雄，因此赢得众反叛者的拥戴。凯蒂琳加入并领导反罗马的军事行动，改变了这次事变的性质，使“叛乱”变为“起义”，这是他人性因子作用的结果。

凯蒂琳留在罗马发动起义的选择使他走上了英雄之路。但这是在兽性因子占主导地位 and 理智昏迷的情况下做出的，他没有考虑起义的条件和时机，更没有认清弗瑞亚的险恶动机，因此他选择的是一条失败之路、毁灭之路、不归之路，他的这一选择是非理性的。

战场上的伦理选择：当烈士 / 俘虏还是罪人 / 逃兵？

凯蒂琳选择留在罗马发动起义，以实现英雄梦想，因此同时陷入两个战场：一个是罗马政府军镇压他起义的军事战场，一个是弗瑞亚向他复仇的情感战场。两个战场重叠在一起，其目标都是置凯蒂琳于死地。凯蒂琳若要实现理想，就必须在这两个战场上获胜。可是他在这两上战场上都遭到失败，最后以死告终。

1、军事战场上的伦理选择：当烈士还是做逃兵？

凯蒂琳虽然成为起义领袖，但他无力消除像兰吐勒斯等人的私心和叛卖行为，这为起义失败埋下祸根。但起义的最大祸患来自弗瑞亚的暗算。当凯蒂琳发动了反罗马的起义后，她暗中采取了一系列破坏起义的勾当。首先她利用凯蒂琳的养子库瑞亚斯对她的疯狂爱恋让他去向元老院告密，“这样使叛卖和谋杀一次完成！”（82）然后她又扮成幽灵向凯蒂琳的盟友、高卢使臣发出警告，说：“你们是自取灭亡！”“你们的人民只会遭殃！”“一切追随凯蒂琳的人都决不会有好下场！”（86）吓得高卢使臣撕毁了与凯蒂琳的盟约。由于凯蒂琳的军事行动及其计划被泄露，由于他的军事同盟被拆散，凯蒂琳的败局已定，命运已决。

因此凯蒂琳这时面临着当烈士战死还是当逃兵偷生的选择。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凯蒂琳的人性因子反而得到激发，决心更加坚定，勇气更加雄壮，他的英雄气概和善行也表现得更加充分。他做了关于自己生死存亡的重大抉择：毫不犹豫地选择当烈士。

他领导的起义军驻扎在离罗马城不远的荒野中，夜空中出现一个古代帝王的鬼影向他发出警告：“你将毁灭于你自己所进行的事业，但杀害你的凶手，对你实际上是个陌生人”（99）。凯蒂琳没有被吓退，他说：“他们威胁着我，我现在应该停止行动吗？我是否应该马上回头？不能。我要硬着头皮，毫不犹豫地干下去”（100）。这话表明他对生与死、战与逃已经有了明确的选择：即战死沙场。他的养子、向元老院告密的库瑞亚斯来到他身边忏悔并要他赶快逃走：“快逃吧，如果还有可能，一刻也不能再停留！敌人的军队正从

每一条大路上向这里前进；你的营帐将全被包围”，并请求凯蒂琳处置他，“啊，用匕首刺死我吧”（101）。但凯蒂琳没有逃走，也没有杀他，相反却出人意料地仁慈，对他说“我完全宽恕你”（103）。接着兰吐勒斯雇了两名斗士来刺杀凯蒂琳，想夺取起义大军的最高领导权，没想到却被凯蒂琳捉住。但凯蒂琳也没有处决兰吐勒斯，而是告诉他作战计划已全被泄漏给敌人，兰吐勒斯吓得浑身发抖；他让兰吐勒斯逃命，而自己则坚持冒死领导作战，他坚定地说“我知道如何死去”（109）。敌军的到来丝毫没有引起他的恐惧，相反却激起他昂扬的斗志：“啊，这兵刃声多么悦耳！那盾牌彼此碰击的声音真令人开心！清算的时刻快到了——这正是解除一切疑虑的伟大时刻。我欢迎你的来到！”（109）他还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那咱们就出发吧！通过死亡咱们将能获得光芒四射的不朽的永生！”（111）可见凯蒂琳真不愧为一名英雄。

然而，凯蒂琳走的是一条失败之路，他纵有回天之力，也改变不了失败的命运。但在战争的关键时刻，他选择当烈士，视死如归，这对想当英雄的凯蒂琳来说却是必然的选择。他在战场上表现如此英勇，大义凛然，虽然失败了，但虽败犹荣，仍然是一条英雄好汉。

2、情感战场上的伦理选择：当俘虏还是做罪人？

凯蒂琳与罗马政府军交战的军事战场，实际上也是弗瑞亚向凯蒂琳复仇的情感战场。军事战场以凯蒂琳全军覆没而告终，但情感战场却仍在继续。

凯蒂琳带领起义军冲向战场后，怀着复仇之心的弗瑞亚自以为得计，她说：“他将一去不复返。我一生的伟大任务已经完成。在明天早晨的阳光下，我们将看到他已僵冷”（114）。她以为处在强大敌人包围下的凯蒂琳必死无疑，她万万没有想到，全军覆没后他竟然幸免于死。凯蒂琳虽然活着走出战场，但他很快又进入一个两人的战场、两性的战场、复仇的战场。

尽管凯蒂琳活着，但战败的他灵魂却受了致命伤，他的斯芬克斯因子也受到毁灭性打击，他变成了行尸走肉。当凯蒂琳独自从战场上走出来时，痛苦使他变得麻木。他不仅丧失斗志，丧失情欲，甚至连求生的本能也没有。他说：他“现在却可耻地独自活着，逃过了罗马的兵刃。然后，凯蒂琳也便灭亡”（121）。他对自己的失败感到无比耻辱，认为自己罪孽深重，生不如死。这说明他的兽性因子被阉割了。他的人性因子也一蹶不振。他感到“我已经不再有任何意志；我过去的意愿，在一个个愿望全都落空后，已完全消亡”（123）。他的理想彻底破灭了，万念俱灰，唯求尽快以死解脱，甚至为了求死而不惜再次行恶。

当战败的凯蒂琳再次遇到志在复仇的弗瑞亚时，他竟毫无反抗之意，乖乖做了弗瑞亚的俘虏，任凭一个弱女子摆布和操纵。首先，凯蒂琳接受弗瑞亚对死去战友们的解释，愿意认罪受死。弗瑞亚说：“他们的微笑和眼神不过是向你召唤，让你和他们一起躺下——”，以加深凯蒂琳的罪责感，将他往死路上逼。凯蒂琳竟毫不反驳，说“是的，我真愿意那样！”（121）

接着，凯蒂琳接受弗瑞亚的死亡花环。凯蒂琳已经为全军覆没感到痛不欲生，而弗瑞亚却要给他戴胜利花环，而且都是与死人有关的花环，尤其是让他意识到他是害死她妹妹的罪人，不仅在肉体上折磨他，而且令死念占据他的心，继续将他往死路上逼。弗瑞亚先用血红色的樱粟花做花环，他说“不行，快扔掉它！我讨厌这鲜红的颜色”（121）。弗瑞亚要给他做她妹妹死时戴过的白色灯芯草花环，他也不要，说“啊，多可怕的形象！”（122）于是她问他要不要用带刺的荆棘做花环，说那上面的红色斑点“正是在你的命令

下被抛洒的人民的鲜血”，他感到有些生气，说“够了！”可是她仍不罢休，问他要不要用橡树叶编的花环，说那棵橡树在她妹妹死后便枯萎了，对此凯蒂琳无可奈何地说：“把你能想到的一切报复手段全都加在我的头上吧”（122）。最后他竟然接受了她的花环，说“那就请你快把那含毒的花圈在我额上扣紧”（123）。凯蒂琳之所以听任折磨，不仅因为他感到梦想破灭和罪孽深重，还因为他曾发誓要替弗瑞亚向自己复仇。

更有甚者，凯蒂琳听信弗瑞亚的话，杀死自己的爱妻阿瑞丽亚。凯蒂琳说“我渴望进入地府”，但“在我身后我感到晨空中有一颗朦胧的星星；它使我丢不下这活人的世界”；“它不是一颗星；它是一颗跳动着的、温暖的人的心脏；它不容我离开这里”（124）。这颗星和这颗心就是他的妻子、无比爱他的阿瑞丽亚。弗瑞亚说：“那就让那颗心停止跳动吧！”“你腰间现有匕首——只需要轻轻一刺——那像仇敌一样把咱们俩隔开的星星便将消失，那颗心也将死去”（124-125）。他于是对妻子转爱为恨，当阿瑞丽亚到来时，他说：“我恨你，我完全看透了你的狡猾的诡计。你不过是要让我永远过着活死人的生活”（127）。他将妻子刺倒在地。由此可以看出，凯蒂琳完全没有理智，完全失去善恶标准，完全受到弗瑞亚的操纵，将作为善的化身的阿瑞丽亚视为恶，并因此犯下杀妻的罪行。

最后，凯蒂琳请弗瑞亚刺杀他自己。志在报复的弗瑞亚的最终目的是要杀死凯蒂琳，而战败的凯蒂琳也痛不欲生，唯求一死，于是凯蒂琳在弗瑞亚的一步步引领下最终走向了死亡。凯蒂琳在刺杀妻子后，感到再没有任何牵挂了，可以自由地死去。他将匕首递给弗瑞亚，说：“拿着它——把它直扎进这尸体；那它就会放开，我也便得到了解脱”（128-129）。弗瑞亚接过匕首，将匕首深深刺进凯蒂琳的心脏。弗瑞亚刺死了凯蒂琳，既报了仇，也使凯蒂琳得以解脱，从而成全了他的心愿。就这样，处于沉重罪责感困压下的凯蒂琳毫不反抗地死在一个女子弗瑞亚的手下，死在其复仇女神的手下。

由此可看出，凯蒂琳在情感战场上选择既当罪人又当俘虏。他在千军万马的军事战场上尚能奋力拼杀死地得生，却在两个人的异性战场上甘当俘虏引颈求戮。这实际上是他的兽性因子和人性因子双双缺失、受非理性意志主导的结果。

临死前的伦理选择：进天堂还是进地狱？

凯蒂琳被刺意味着他生命的结束和戏剧冲突的解决，实际上也是戏剧的真正结局。但信仰基督教的作者易卜生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还有灵魂入天堂或进地狱的选择，因此又补了一个尾声。这时凯蒂琳的人性因子复活，理性恢复，选择死后灵魂随妻子进天堂。

战败的凯蒂琳在心灵上受了致命伤，本需要像她妻子阿瑞丽亚那样的呵护、理解和宽慰，然而他受伤的心灵却被志在复仇的弗瑞亚控制、操纵和伤害，使他不仅看不到希望和前途，反而感到负罪深重，唯求以死解脱。弗瑞亚将匕首刺进他的心脏，就像揭开了蒙在他眼前的黑幕，在死亡前的片刻中，他突然醒悟，他的人性因子复活了，理智突然清醒了。

凯蒂琳本以为他死后必定要去黑暗的地狱，那冥河的渡船将“直把我送往无声之王的领地，送到那阴魂所在的地方。那边有两条大路摆在面前；我将一声不响朝左边奔去”（129），他以为这是命运之神安排好的。因此当他听到一息尚存的妻子说：“不，应该向右！啊，走向极乐世界”，他却说：“我们必须分手”，“我却只能跨过遗忘之河，向着永恒的黑夜走去”（130）。妻子却说：“不，爱情能完全驱散死的恐惧和黑暗。瞧，带着风暴的云彩已经消散；晨星已闪着微光”。这时他记起以前的梦境：“我梦见一片黑暗在一道金光前逃得无影无踪，我梦见一群孩子歌唱着迎来新生的一天”。这个梦也是他命运的象征，

意味光明将取代黑暗，他的死就是他的新生。于是，在他死前的最后瞬间，他的理智突然恢复，“我的思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醒”。凯蒂琳认识到他死后灵魂不必去黑暗的地狱，因此他做出人生最后的一个选择：要和妻子一起去光明的天堂。他对妻子说：“我将跟你一起去寻找一个光明的地方安身！”，“你用你的爱已将黑暗势力征服！”（131）。说完，他将头最后落在妻子的胸膛上死去。

尽管凯蒂琳时代基督教还没有诞生，但作者易卜生却生于基督教世界。从基督教的伦理来看，人生中最重要事情，就是死后灵魂去地狱还是去天堂。凯蒂琳的这一最后选择，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它是他理性恢复的结果，也是他人性因子发生作用的结果。

综上可知，凯蒂琳在事业上和爱情上面临的矛盾，使他在这两个方面分别做出了一系列的伦理选择，从而也形成贯穿本剧的两条伦理线（ethical lines）：第一条是政治伦理线，即怀有崇高政治理想的政治家凯蒂琳受到西塞罗等元老院贵族的排斥，他感到强烈不满并领导起义，最后以失败告终。第二条是爱情伦理线，即生性放荡的凯蒂琳遭到灶神庙女尼弗瑞亚的复仇，最后被弗瑞亚刺死。这两条伦理线因弗瑞亚的复仇而交织在一起。

总之，斯芬克斯因子理论为我们认识凯蒂琳的形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方法。凯蒂琳的性格复杂多变，许多言论和举动似乎不太合乎情理，难以为读者和观众所理解，这可能是该剧不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如果运用斯芬克斯因子理论加以阐释，不仅凯蒂琳的性格得以揭示，而且该剧的情节和思想也变得容易理解。

注解【Note】

①本文关于《凯蒂琳》的引文，均出自亨利克·易卜生：《凯蒂琳》，黄雨石译，见《易卜生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以下引用只标出具体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哈罗德·克勒曼：《戏剧大师易卜生》，蒋嘉 蒋虹丁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Clurman, Harold. *Ibsen*. Trans. Jiang Jia and Jiang Hongding. Changsha: Hu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5.]

盖乌斯·撒路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喀提林阴谋 / 朱古达战争》，王以铸 崔妙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

[Crispus, Gaius Sallustius. *The Conspiracy of Catiline and the Jugurthine War*. Trans. Wang Yizhu and Cui Miaoyi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4.]

亨利克·易卜生：《易卜生书信演讲集》，汪余礼 戴丹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

[Ibsen, Henrik. *The Collection of Henrik Ibsen's Letters and Speeches*. Trans. Wang Yuli and Dai Danni.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2.]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责任编辑：王树福